

引资竞争视角下FDI 对中国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宋一弘 著

■本书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引资竞争背景下 FDI 对中国经济绩效的影响，包括影响机理、影响路径以及表现形式等内容。同时，针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引资策略，本书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可行性的建议，能够为政府决策、学术研究、企业实践等提供参考和借鉴。



中国金融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3BJY023)

引资竞争视角下 FDI 对中国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宋一弘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肖丽敏

责任校对：张志文

责任印制：赵燕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引资竞争视角下 FDI 对中国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宋一弘著.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9.3

ISBN 978 - 7 - 5049 - 9837 - 8

I. ①引… II. ①宋… III. ①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中国经济—经济增长—研究 IV. ①F1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7575 号

出版
发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 2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66347, 63805472, 63439533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尺寸 169 毫米 × 239 毫米

印张 13

字数 182 千

版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2.00 元

ISBN 978 - 7 - 5049 - 9837 - 8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3263947

前 言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开始大举进入中国。经过四十年的发展，FDI 在总体上对缓解中国的资本短缺、推动技术创新和促进经济增长等产生了积极作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的基础性要素。但与此同时，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行“经济分权”和“政治晋升”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在引进 FDI 的过程中产生了激烈的竞争，进而导致了引资行为的扭曲，最终对中国整体经济绩效造成了负面影响。本书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构建出一个“引资竞争视角下 FDI 影响中国经济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别对以下两方面内容进行实证检验：一是 FDI 对中国经济在资本、技术、制度、市场等方面产生的效应；二是 FDI 是否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清洁增长。

通过研究，我们得到了以下结论：

第一，改革开放在总体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具有积极作用，而在“经济分权”和“政治晋升”的特殊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化、表面化政绩，在引资过程中异化了竞争行为，进而弱化了 FDI 对区域经济的市场化改良效果；地方政府与外资企业在引资谈判中处于不对等的议价地位，导致了前者对后者的“依从”，或者在最大化利益驱使下地方政府与外资企业存在“政企合谋”，造成了社会总体福利耗损。

第二，FDI 在总体上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显著的资本效应、技术效应、

市场效应和制度效应，但四类效应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FDI 的资本效应和技术效应对缓解中国国内资本短缺和提升内资企业技术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FDI 的市场效应更多地表现为外资商品对内资商品的挤占甚至挤出，即负向效应；FDI 的制度变迁效应在总体上具有积极作用，主要体现为促进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和提高了行政效率。

第三，FDI 对各个地区的经济效应表现出显著差异性。FDI 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市场化发展，FDI 的资本效应和技术效应对东部地区经济具有正向影响，并且技术效应的作用强于资本效应，FDI 的市场效应对东部地区经济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FDI 流入对东部地区经济表现出积极的制度变迁效应，并且该效应大多通过资本和技术渠道获得，而较少通过消费（市场）渠道获得；在中部地区，FDI 的资本效应和技术效应对地区经济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FDI 的市场效应同样表现出外资商品对内资商品的挤占甚至挤出，FDI 的制度变迁效应主要通过资本和消费（市场）渠道获得，而较少由技术渠道获得；在西部地区，FDI 流入并未显著提高该区域的市场化程度，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市场分割。

第四，FDI 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行业经济的分化发展。FDI 流入后，它对农、林、牧、渔等行业的市场化发展具有负向影响，而对制造业等行业的市场化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在主要行业中，FDI 的资本效应和技术效应差异显著，FDI 的市场效应表现出外资商品对内资商品的挤占或者挤出，FDI 的制度变迁效应大多通过资本渠道和技术渠道获得，而较少通过消费（市场）渠道获得。

第五，FDI 流入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但同时存在明显差异。FDI 流入对三类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混合企业）的市场化发展都具有正向影响；FDI 的资本效应和技术效应在三类所有制企业中都产生了正向效应，FDI 的市场效应对国有企业具有正向影响，对其他两类企业（民营企业和混合企业）表现出负向效应；FDI 的制度变迁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和混合企业中，而在国有企业不显著。

第六，FDI 流入产生的资本效应和技术效应促进了中国经济绩效的提

升，但外资企业日益增强的市场控制力导致其在中国某些市场上形成了“寡占”，从而表现出对内资企业的市场攫取效应；FDI 在进入中国行业和企业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关系维护”和“合谋”特征，该特征不仅强化了中国某些行业的垄断程度和“国进民退”趋势，还进一步阻碍了民营经济发展。

第七，引资竞争背景下的 FDI 流入并没有改善中国的腐败现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恶化作用；样本期内，腐败与 FDI 呈倒“U”形关系，并且在总体上二者目前还处于前半阶段，即腐败对 FDI 具有“润滑效应”；中国经济绩效具有腐败与 FDI 相互强化推进的可能，即中国经济增长存在“腐败式增长”的特征，并且这种特征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和时间差异。

当下，中国应积极调整外资战略，将引资重心从重“量”转变到重“质”上来，进一步发挥 FDI 的正向经济效应，以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和清洁发展。为此，首先，规范地方政府的引资和用资行为，通过优化制度安排，推进引资与用资的机制建设，弱化政府行为的盲目性和自利性，提高制度质量对 FDI 的“拉力”；其次，中国今后的引资政策应该以产业的“东转（移）西承（接）”和产业升级为核心，通过实施差异化的引资策略，提高 FDI 与中国各区域经济现状和特征的匹配性；最后，应当积极调整和优化 FDI 在中国各行业 and 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分布，以促进中国行业经济的高端化发展，并通过消除政策在企业间的“内外有别”和“政治性主从次序”歧视，为不同所有制企业营造平等的发展环境。

作者：宋一弘
2018 年 8 月 20 日

目 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与提出问题	1
1.2 概念界定与说明	5
1.2.1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概念的说明	5
1.2.2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说明	7
1.2.3 关于 FDI 流入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说明	7
1.3 研究目标、思路及方法	8
1.4 研究框架及内容	9
1.4.1 研究框架	9
1.4.2 研究内容	9
2 文献评述	12
2.1 引言	12
2.2 外商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理论演进	13
2.2.1 资本效应	13
2.2.2 技术效应	15
2.2.3 制度效应	17
2.2.4 市场效应	20

2.3	国内外证实研究成果	22
2.3.1	FDI 经济效应研究	22
2.3.2	FDI 经济效应的进一步探讨：腐败与经济增长	33
2.4	本章小结	41
3	引资竞争视角下 FDI 对中国经济绩效的影响：理论框架	43
3.1	引言	43
3.2	FDI 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	44
3.2.1	基本分析	44
3.2.2	进一步解释	48
3.3	FDI 经济效应的进一步探讨：腐败与经济增长	49
3.3.1	基本分析	50
3.3.2	进一步解释	53
3.4	本章小结	55
4	中国利用 FDI 的政策演进与主要特征	57
4.1	引言	57
4.2	中国引资政策的演进	57
4.3	FDI 在中国发展的主要特征	67
4.3.1	FDI 来源地构成	67
4.3.2	FDI 在中国的地区分布	70
4.3.3	FDI 在中国的行业分布	75
4.3.4	FDI 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与投资模式	77
4.4	本章小节	79
5	FDI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81
5.1	引言	81

5.2 模型设定与变量度量	82
5.2.1 模型设定	82
5.2.2 变量度量	83
5.3 变量处理与数据说明	87
5.3.1 变量处理	87
5.3.2 数据说明	90
5.4 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92
5.4.1 全样本检验	92
5.4.2 分地区检验	96
5.4.3 分行业检验	104
5.4.4 分企业所有制检验	115
5.5 本章小结	120
6 FDI 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清洁增长吗	123
6.1 引言	123
6.2 模型设定、变量度量及数据说明	124
6.2.1 模型设定	124
6.2.2 变量度量及数据说明	125
6.3 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129
6.3.1 全样本检验	129
6.3.2 分地区检验	132
6.3.3 分时期检验	139
6.4 稳健性检验	147
6.5 本章小结	154
7 结论与展望	157
7.1 主要结论、政策含义与创新点	157

7.1.1 主要结论.....	158
7.1.2 政策含义.....	162
7.1.3 可能的创新点.....	167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168
参考文献	171
致谢	194

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与提出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作为跨国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在全球流动的金额逐年增加。1990 年，FDI 的全球流动量为 2075 亿美元，而到 2017 年，该数字达到 14300 亿美元，前后比较增加了 5.89 倍。伴随着 FDI 流动量的增加，它在区际流向上也呈现出显著的变动趋势。1990 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吸收的 FDI 金额分别为 1725 亿美元、349 亿美元和 0.75 亿美元，而到 2017 年，这一数字分别增加到 7120 亿美元、6710 亿美元和 470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了 3.13 倍、18.23 倍和 625.67 倍，表现出发展中国家及转型国家的引资能力不断增强，而发达国家趋于弱化的特征（UNCTAD, 2017）。针对上述现象，学界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之所以表现出对 FDI 的普遍热情，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 FDI 会将其内含的资本、技术、制度等因子带入东道国，从而对其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包括缓解资本短缺（Chenery 和 Strout, 1966），推动技术创新（Borensztein、Gregorio 和 Lee, 1998），促进经济增长等（Farrokh Nourzad, 2008；Thanh 和 Duong, 2011；Pegkas, 2015；葛文进和俞立平, 2017）。

从本质上看，FDI 在全球快速流动的根本动力是对最大化利润的追逐。

那么,哪些因素将对它们的区际流向产生影响?对于该问题,学界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东道国资源禀赋与 FDI 流动的关系研究。Kojima (1978) 认为 FDI 的流动动机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导向、市场导向、生产要素导向和企业国际化导向。对于以自然资源和市场为导向的 FDI,它们较为关注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及市场潜力;而以生产要素和国际化为导向的 FDI,它们则更加关注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及合作空间。在此基础上,Navaretti 和 Barba (2004) 将 FDI 分为垂直型和水平型两类。对于垂直型 FDI,它们主要受东道国市场规模驱动;而对于水平型 FDI,它们则更加关注东道国的要素禀赋。与其持相近观点的还有 Deng (2003),他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视角对 FDI 的投资动机进行了研究,认为发达国家由于受本土资源禀赋、民众环保意识、国家资源战略等影响而保守开发,国内从事资源密集型企业不得不向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国家转移,从而表现出“要素寻求”动机;而在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企业更为缺乏的是技术、品牌、管理经验等战略性资产,从而对于有条件“走出去”的企业,它们在与外资合作或兼并他国境内企业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战略资产寻求”动机(Cheng 和 Qian, 2008)。后来,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导向的 FDI 产生的溢出效应也不一样,以市场为导向的 FDI 表现出显著的水平溢出效应,而以出口为导向的 FDI 更多地表现出垂直溢出效应。进一步地,李怡和李平(2018)从价值链的角度就不同导向的 FDI 对中国价值链升级进行了研究,发现市场导向型的 FDI 对价值链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出口导向型的 FDI 对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有限。

另一类是关于东道国制度与 FDI 流动的关系研究,OECD (2003) 研究报告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国内政治制度及法律环境,在公平制度缺失、“法律不被信仰”的国家,政府具有通过重税向企业收取租金的“冲动”,企业为求生存,将采取非正常手段来应对此类政府行为。同时,当企业适应了这些国家的“气候”之后会加倍向民众索取,从而造成国民福利的整体下降(Lucas, 1988)。这与孙早和王文(2011)的观点相近,他们认为在一个制度不健全、“法律不被信仰”的国

家, FDI 要么表现出十分脆弱的生存能力, 要么发生“异化”, 通过行贿等非正常手段主动向权力寻求庇护来获取“制度暴利”。Kahai (2004) 研究指出, 一个国家的政府治理水平越高、贸易保护越少, 外资企业到境内投资的交易成本就越低, 因此东道国家的制度质量对 FDI 具有“拉力”效果。Habib 和 Zubawicki (2002) 通过对意大利、德国等国家的研究, 发现政府治理水平和行政效率对 FDI 流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腐败会严重影响 FDI 的流动速度及规模。持同一观点的还有 Mauro (1995) 和 Wei (2000) 等人, 他们发现腐败会明显增大 FDI 流动过程中的阻力, 政府官员为获取贿赂, 会延长外资进入的审批时间, 增加审批程序, 从而挫伤外商的积极性, 弱化 FDI 的流入动力。岳蛟兴和范涛 (2014) 从制度环境的视角, 就中国对亚洲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进行了研究, 发现中国 FDI 总体偏向于自身制度差距较大且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 但与自身制度环境差距较小的国家更加吸引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效率寻求型 FDI。与此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张云飞 (2015), 他通过研究认为, 东道国的禀赋条件和制度安排对 FDI 的区位选择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并且 FDI 在选择投资目的地时都表现出显著的“制度接近性”特征。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实行对外开放以来, 流入国内的 FDI 金额快速增加。2017 年, 中国实际利用 FDI 金额达到 1310 亿美元, 与 1990 年的 35 亿美元相比, 增加了 37.43 倍, 远高于世界发展中国家在该时期的平均倍数 (18.23 倍)。面对上述现象, 人们不禁会问, 哪些因素促进了 FDI 大量进入中国? FDI 流入后, 它对中国经济绩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对于第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 FDI 大举进入中国, 不仅是因为其具有显著的资源禀赋优势, 可能更为重要的原因是, 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安排为 FDI 流入提供了显性 (地方政府的引资竞争) 和隐性 (官员腐败) 的便利, 使其充分享受了经济转型带来的制度和政策红利。

从显性的制度安排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中央政府一方面通过分税制改革将部分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 以提高后者发展辖区经济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政治治理上依然保持集权领

导,实行上级对下级的垂直管理,这样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就形成了“经济分权”激励与“政治集权”控制的独特治理结构。为实现政治晋升,地方官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表现出强烈的“唯经济增长是重”趋向,竞相追求短期化、表面化的政绩,从而形成了锦标赛竞争。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地方官员都将尽可能实现以政绩为中心的目标函数最大化,表现出在各个方面“为增长而展开竞争”的强激励(傅勇和张晏,2007)。对于 FDI,由于它能够有效缓解内资短缺、推动技术创新和促进经济增长,进而有利于政绩目标的实现,从而成为地方政府争夺的对象,最终产生了激烈的引资竞争现象。

从隐性的制度安排看,经济分权虽然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辖区经济的积极性,但同时也可能恶化了官员的腐败行为(Treisman, 2000)。中央政府通过政治晋升虽然可以对锦标赛竞争中的胜利者进行“奖励”,但在中国长期的制度机制下,官员作为普通民众的正常收入水平往往与其具有的社会层次、生活水平不符,工资收入增长缓慢,没有反映出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共享”。因此,官员基于经济人的理性将会“盘活”手中资源来增长自身的私利(Leiken, 1996)。外资企业进入后,它们具有比国内企业更强的效率意识,为了减少官员不作为对自身造成的“时间税”,外资企业具有向其支付“行贿税”的动力(Rosa et al, 2010)。同时,外资企业为了获得优质资源、合约、授权、配额等优先权,会主动向官员靠近,通过发展非正式关系或“合谋”来“共同盈利”(黄亚生, 2005);或者他们利用地方政府对自身的“依从”,通过各种手段来影响立法、政策而对政府进行俘获(State Capture)(Qasim, 2011),从而在整体上降低了国民福利。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FDI 流入后,它对中国经济绩效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FDI 作为母国资本、技术、制度、管理经验的“集成体”,它流入中国后对国内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效应,比如通过缓解国内资本短缺而产生资本效应,通过促进技术水平提升而产生技术效应,通过与投资地政府交流合作而产生制度效应等。从这一角度看,FDI

业已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要素。另一方面, FDI 流入后, 它在中国区域分布上具有明显的“扎堆”现象 (Sun, 1998), 其大部分都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 而流向中西部地区的份额明显偏少, 呈现出显著的地域不均衡分布特征, 进而影响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Choi, 2006; Basua 和 Guariglia, 2007)。同时, 外资企业不断利用地方政府对自己的“依从”来提高“超国民待遇”资格, 从而影响了政府权力运用过程中的公益性 (冈纳·缪尔达尔, 1991), 产生外资企业对政府的“俘获”; 或者外资企业主动向政府靠近来寻求权力庇护, 从而为官员谋取私利创造了机会, 产生政企“共同盈利”目标下的腐败 (乔尔·赫尔曼、杰林特·琼斯和丹尼尔·考夫曼, 2009)。

本书基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分权”与“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 从地方政府引资竞争的视角出发, 利用中国多个层次的面板数据, 就 FDI 进入后, 它对中国经济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通过研究, 我们试图回答如下问题: (1)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 大量 FDI 进入后, 它一方面对中国整体经济产生了多个方面的影响 (经济效应); 另一方面它加剧了中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那么, 引资竞争背景下 FDI 的经济效应在不同层面 (城市、行业、企业) 有哪些具体表现、特征和差异? 地方政府的引资行为是否扭曲了 FDI 经济效应的发挥? (2) 随着 FDI 的大量流入, 中国经济一方面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另一方面它在实现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又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那么, 腐败、FDI 与经济增长三者间具有怎样的关系? 它们在不同地区又具有怎样的差异?

1.2 概念界定与说明

1.2.1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概念的说明

外商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作为国际投资的重要形式, 它也被称作国际直接投资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IDI)。对

于 FDI 的定义,目前学界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有的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核心在于投资者对“经营资源”的关注,支持该观点的日本学者原正行(1992)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企业“经营资源”的全球化转移,它主要包括人、财、物、信息等对企业经营发展起到决定作用的生产要素。与其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日本学者小岛清(1987),他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投资主体将资本、技术、管理经验、人力资源、设备等“经营资源”向东道国转移的行为。有的学者则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核心在于投资者对“控制权”的掌握,澳大利亚学者 A. G. 肯伍德和 A. L. 洛赫德(1997)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是投资者对投资企业经营管理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该企业实际控制权的要求。

在国际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界定主要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根据 OECD 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定义,它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的跨国公司在母国之外的东道国企业建立长期投资关系,以获得持久利益为目的,并对投资行为进行有效控制的投资活动”。根据 IMF 的定义,外商直接投资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他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换言之,它是一国(地区)实体(个体或企业)与他国的企业建立长期关系,享有持久利益并对其进行控制的投资行为,这种行为既涉及两个实体之间最初的交易,也涉及二者之间的所有后续交易。

在国内,根据 200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对外经济贸易统计指标解释,外商直接投资指的是“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规定,当一个企业的外资(包括港澳台)股本占注册资本的 25% 及以上,该企业则被看作是外商投

资企业。因此，本书对外商直接投资概念的界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的解释为准，FDI 特指各类境外投资主体（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对中国境内的投资行为。

1.2.2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说明

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Economic Effects），一般是指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后，它对东道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产生的诸多影响，这些影响既可能促进了东道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正面效应），也可能对东道国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秩序等产生冲击，甚至带来不利后果（负面效应），但对于它的准确定义，学界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同时，由于学者们研究侧重点的差异，他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内涵表述也存在差异，其中，有的学者关注经济效应的宏观指标，比如经济增长、资本形成、产业结构调整、国际贸易平衡等（崔校宁和李智，2003；赵蓓文，2009）；有的学者则更加关注它的微观意义，比如员工培训、交流产生的管理水平提升等（亓朋、许和连和艾洪山，2008；陈琳和林珏，2009）。

本书对外商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界定，既包含它在宏观层面（城市、地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包含在微观层面（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其主要考察 FDI 进入后，它经由资本、技术、消费（市场）等渠道对中国资本形成、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等产生的正面效应，也关注 FDI 流入可能对中国腐败治理、市场合理竞争、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等产生的负面效应。因此，这里的经济效应包括两个方面，其中，正面效应包括：资本增长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制度变迁效应等；负面效应包括：资本挤出效应、市场攫取效应等。

1.2.3 关于 FDI 流入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所有制结构开始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为了科学、统一地划分国民经济中的企业类型，规范统计口径，正确反映和研究企业所有制结构，并更好地为宏观决策、管理等提供依据，国家统计局